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 | | |
|--------|-----------------------|-----|
| 【各抒己见】 | 谈朱成昭与聂元梓的区别兼论造反派的“异化” | 舒 声 |
| 【春秋史笔】 | 追溯毛泽东思想的轨迹 | 华新民 |
| 【亲历者言】 | 徐家汇教堂蒙难记 | 于吉星 |
| 【跌宕人生】 | 走出困沌——我的文革经历实录（下） | 江明德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各抒己见】

谈朱成昭与聂元梓的区别兼论造反派的“异化”

• 舒 声 •

近日读到《文革博物馆通讯》981期上王复兴的文章“文革史应浓墨记载的一个名字——朱成昭”，感到朱成昭确是一个应该研究的人物。作为北京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首都红卫兵三司的司令，曾在北京高校文革中有相当的影响力，如果他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亦步亦趋，一定会成为北京高校的学生领袖之一，进入红代会和市革委会，成为文革舞台的风云人物。但是由于他是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又受到了彭德怀和叶剑英等老干部的影响，很早觉醒，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和批判文化大革命，所以不仅被免除了职务，而且被关入监狱直到1975年才被放出，1980年才被平反，1998年不幸早逝。他可以被称为一个“另类”的造反派领袖，或者被称为一个“异端分子”。他生前曾整理和写作了不少有关文革的回忆资料，去世前交给了其弟一北大经济系64级的朱成华，可惜不久之后朱成华也去世了，这些资料至今未能面世，是十分遗憾的。

一、朱成昭与聂元梓的区别

按照王复兴文章所写，朱成昭在文革初期做了五件大事：一、反工作组，争自由；二、四进地质部，争人权；三、销毁黑材料，反迫害；四、同情彭德怀，为彭鸣不平；五、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

这五件大事在当时确实都是不同凡响的，其中前三件，应该是符合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符合中央文革要求的；而后两件，却是当时被认为大逆不道而现在看来却是一种英雄的壮举。特别是1967年2月4日，朱成昭在地质学院全校大会上的“假检查，真炮打”，亮出了所谓的八大观点，直接批评了权势熏天、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更是一种十分勇敢的行动。王复兴在文章中称赞朱成昭是“老五届大学生中从反抗专制压迫，到迷枉（应为迷惘）、彷徨，再走向觉醒的杰出典型，是先知先觉者”，也许并非过誉。

但是王复兴文章后面却笔锋一转，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聂元梓身上。聂于1967年2月后，对文革发生怀疑，证据即她于1967年2月、7月、8月，三次提出解散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同时自己辞去校文革主任之职。第一次在2月，在新北大公社战斗队联席会议上，她的提议被群众否决；第二次在7月，在北大校文革常委会上，她的提议被常委会否决；第三次在8月，在中央文革接见会上，她的提议又被否决，并遭到江青严厉批评。她被毛泽东树为文革的一面红旗，却想撂挑子不干了！背后一定有深刻的考虑，她是怎么想的？”

把聂元梓和朱成昭相提并论，认为聂元梓也反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两个人根本不是一路人。

众所周知，聂元梓是毛泽东树立起来的第一个造反派典型，是江青点名让她主持筹建了全国高校第一个文化革命委员会，并成为主任，1967年又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而且一直紧跟中央文革和江青，直到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才被剥夺了权力。说她和朱成昭相同，在1967年就反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是不能够令人信服的。我们就按照王复兴文章说的五件事，来比较一下朱和聂的不同：

（一）朱成昭受工作组迫害，争自由，聂元梓受工作组信用，是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虽然没有实权，但起码是有自由的，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她只是在7月22日，得到内部消息后，才在哲学系讲话批评工作组，之前也没有任何反对工作组的言行。

（二）朱成昭四进地质部，争人权，聂元梓和校文革把大量的干部、教师关入牛棚，剥夺他们的自由，被监督劳动，监管人员对他们非打即骂，严重侵犯了他们的人权，这在季羨林的《牛棚杂忆》和郝斌的《流水何曾洗是非》中都有很多记载（1、2）。

（三）朱成昭销毁黑材料，反迫害，聂元梓的校文革却继承了工作组的“二组”和黑材料，又新整了许多干部、教师 and 学生的黑材料，迫害不同意见的群众（3）。她为了彻底消灭反对派组织，竟悍然发动了3·29大武斗，把反对她的学生从31楼宿舍中赶出，并围困反对派的学生达4个月之久，断水、断电、断粮，打死无辜学生三人，打伤数百人，私设监狱，随意抓捕学生、教师，刑讯逼供，导致多人残废（如邓朴方、樊立勤等）（4）。

（四）朱成昭同情彭德怀，为彭鸣不平，而聂元梓及其校文革和下属组织积极参与攻击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她控制的喉舌《新北大》校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了许多攻击和反对老一辈革命家、党和政府、军队领导人的文章，例如该报最早刊登了攻击朱德同志的文章，1967年2月6日第一版至第四版：《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1967年3月4日第四版：《看朱德的反动嘴脸——朱德在抗战胜利后鼓吹的反动政治路线》；对于朱成昭同情的彭德怀，《新北大》也毫不留情，在1967年8月9日第一版至第三版刊登《打倒老牌反革命彭德怀》，在1967年8月26日第一版刊登《彭德怀的海瑞精神是什么货色》。《新北大》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负责人的文章数量之多、篇幅之长、影响之广，在文革报刊中都是十分突出的（5）。

（五）朱成昭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紧跟中央文革，效忠和谄媚江青。1966年7月26日晚上，在北大全校大会上，江青代表中央文革，亲自点名让聂元梓筹备成立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自此聂和校文革始终效忠中央文革和谄媚江青，甚至到了肉麻的程度。例如1968年3月27日，《新北大》第2版，以“本刊编辑部”名义提出“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第三

版高唱赞歌《革命的硬骨头、毛主席的好战友——学习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写到：“新北大公社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和江青同志心连心。”1968年5月13日，《新北大》第二版，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提出“谁反对江青同志，就让他人头落地”。1968年7月1日《新北大》第二版，发表《江青同志赞》，盛赞江青“是我们的代表，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旗帜。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把毛主席这首震撼山河的千古绝章，献给敬爱的江青同志。”1968年7月5日，《新北大》出版歌颂江青的专辑，在社论《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中肉麻地吹捧：“江青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她光辉的名字永远彪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史册，她英雄的业绩在耸入云天的中国革命丰碑上永远放射着不可磨灭的战斗光芒！江青，这响亮的名字，永远和青春联系在一起，永远和战斗联系在一起，永远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永远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心联系在一起！想起您，我们就激情如潮涌；听到您，我们就力量百倍增！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誓死保卫您，就是保卫亿万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誓死保卫您，就是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誓死保卫您，就是保卫我们最高红司令！”〔6〕

至于王复兴所说的聂元梓的三次辞职，只是在少数人参加的内部会议上提出的，北大绝大多数师生并不知道。当时的背景是：1967年春季，在北大开展的整风中，许多群众包括校文革内部成员和聂元梓往日的社教战友，对她的工作作风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她非但不接受，反而给这些提意见者扣上“反对红色政权的帽子”，把一些校文革中不同意见者赶了出去，导致北大反对聂元梓的人数越来越多，成立了许多反对她的群众组织，打破了她的一统天下，聂元梓恼羞成怒，以退为攻，提出辞职作为要挟；此外由于她在社会上到处伸手，与谢富治产生矛盾，触犯了中央文革中的某些人，对她提出了批评（如陈伯达的6·5讲话），在此情况下，她提出辞职，也是一种试探，看中央文革是否还继续支持他，后来江青、陈伯达讲话，说对她的批评是对她的爱护，不是要打倒她，于是她也就不再说辞职的话了。可见聂元梓的辞职不过是一种手段，并不是真正要辞职。把她的辞职说成是怀疑文革，反对文革，是毫无根据的，把她和朱成昭相提并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二、关于文革造反派的“异化”

王复兴在其文章的最后，提出一个造反派“异化”的概念。“异化”是一个哲学概念，360百科上说：“人的异化是指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不太好理解。估计王复兴也未必对异化这个概念有什么研究，他说的造反派异化应该是指造反派从文革开始到以后的变化吧，我们姑且这样理解。

文革初期的“造反派”提法应从清华附中红卫兵文章中引用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开始，一般指的是造本单位党政领导（走资派）的反，或造被派到本单位的工作组的反的个人或组织，例如北大的聂元梓是造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珮云的反，清华的蒯大富是造工作组和王光美的反，地院朱成昭是造工作组和地质部领导的反，中学红卫兵是造本单位校长、书记或工作组的反，上海王洪文是造市委的反等等。这些造反派在文革初期（1966年6月到7月底）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但随着毛泽东7月底回到北京，工作组的撤出，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多次接见红卫兵，造反派得到了支持，士气大涨，成为文革的主力军，很多造反派领袖在本单位掌了权有的甚至到省市、中央当了领导人。但随着运动的发展，造反派组织在不断变化，造反派头头也在不断变化甚至分化。本人对此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在此简单地区分一下造反派变化的几种类型：

（一）膨胀派

这类造反派的头头在得到中央领导支持，掌握了本单位大权后，头脑膨胀，自以为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听不得不同意见，对反对自己的群众实行镇压。这类造反派头头以聂元梓和蒯大富为代表，他们分别掌握了北大和清华的大权后，在社会上紧跟中央文革，成为中央文革的工具，在校内残酷迫害干部、教师 and 不同意见的学生，把反对自己的群众抓起来，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直到1968年春季发动武斗，围困对立面组织的群众，打死打伤多人，1968年7月27日，蒯大富竟利令智昏，打死打伤制止武斗的工人宣传队员，惹怒了最高领袖，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结束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文革后期，他们被隔离关押，文革后被判刑。全国各地造反派头头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例如王洪文也属于此类。

（二）觉醒派

这类造反派，初期也参与了和本单位领导或工作组的斗争，当上了头头，甚至得到中央文革的信任，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些是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影响，有些是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发现了文革的问题，及早地觉醒，不愿再做文革的工具，甚至反对文革。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朱成昭。此外江西还有一个李九莲，也应属于此类。李九莲原是赣州第三中学学生、学生会学生部长、校团委宣传部长。文革中任第三中学造反兵团负责人。1967年6月29日—7月4日，江西赣州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168人死亡。李九莲在收尸时受到刺激，开始对文革提出疑问。1969年2月，李九莲被分配到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这她将自己对“文革”的思考写入日记。同年5月1日，李九莲被部队的男友告发而被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拘留审查。1976年，文革结束后，李九莲因当局拒绝为其平反而继续表示抗议，12月，写了《我的政治态度》。1977年12月14日，江西省省委认定李九莲在服刑期间重新犯有反革命罪，同意波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李九莲死刑，并放在其家乡赣州执行。当天，在赣州体育场召开了公判大会，李九莲被五花大绑，押至公判大会现场。为避免她在公众场合呼喊口号，她的下颚、舌头被一根竹签刺穿成一体，上午10时，李九莲被押往西郊通天岩下受刑。

1980年1月，胡耀邦作出批示，此案得以重新审查，李九莲获得平反〔7〕。

这类觉醒派，在全国范围内还有许多。

（三）再造反派

这里所说的再造反派指的是从原来的造反派队伍里分离出来，再次造反，造的是原来造反派头头的反，也就是造“膨胀派”的反。例如聂元梓、蒯大富在掌权后依仗中央文革支持，倒行逆施，镇压群众，他们原有队伍中一些人发现了问题，有不同意见而受到了排斥，就拉出一支队伍，反抗聂、蒯，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清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等新的组织，人数也有数千人之多，形成了校内的反对派，其领袖有牛辉林、侯汉清（北大）、沈如槐、孙怒涛（清华）等。他们中有一些人对文革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行为制约了膨胀派的继续膨胀，受到了膨胀派的打击镇压，导致了大规模武斗的发生，引起了高层的注意，派工人、解放军进驻学校，解除了膨胀派的权力，成为文革进程的转折点。这类情况在地方造反派组织中也有很多发生。

（四）逍遥派

这类人物在中学造反派中居多。文革初期，他们成立红卫兵和纠察队，在“红八月”中很出风头，破四旧，抄家，殴打、驱赶城市中“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甚至打死本校的校长、老师。后来他们自己的父母大都成了“走资派”，情绪自然一落千丈。他们中有些人对江青也有看法，曾被短期关入监狱。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了逍遥派，不再过问文革运动。1968年，他们大都上山下乡，有关系的参军去了。当然，逍遥派并不是对文革没有看法，文革后他们中很多人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有些人成为了官员、企业家、学者、作家。

造反派的遭遇和他们的思想变化过程，应该也是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本人只能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这种简单的分类，也许并不科学。但希望抛砖引玉，引起更多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季羨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 2、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大块文化出版社，2014；
- 3、舒声，北大校文革二组整了哪些“黑材料”，张从、奚学瑶、樊能廷主编《燕园沉思录》，286—289，社会文献出版社，2018；
- 4、司徒文，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樊能廷，“人道的用刑”与三个学生的遭遇，张从、奚学瑶、樊能廷主编《燕园沉思录》，236—252，392—402，社会文献出版社，2018；
- 5、张从，从校刊《新北大》看北大文革，张从、奚学瑶、樊能廷主编《燕园沉思录》，320—330，社会文献出版社，2018；
- 6、樊能廷，北大校文革与江青，张从、奚学瑶、樊能廷主编《燕园沉思录》，254—266，社会文献出版社，2018；
- 7、老鬼，李九莲案始末，新浪博客，2015。

【春秋史笔】

追溯毛泽东思想的轨迹

• 华新民 •

◇ 邓小平：不知文化大革命要达到什么目标

邓小平于一九八六年七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顾委联席会议上，作过如下的发言：“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政治评价，我们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错误要由我们的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泽东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从部署、策划，到展开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这当然毛要负很大责任。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也包含了对毛的评价。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这里面有多种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对此，陈云提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作为一项建议性决议讨论表决。出席联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共五十六人，表决结果：五十二票赞成，二票反对，二票弃权，通过。

这段话据说是万里在今年（2005年）给中共政治局的信函里面提到的，当然很难得到官方的证实，笔者倾向于认为符合当时中共领导人的思想。发言不长，却是微言大义，不说“一句顶一万句”，但每句话都值得细细琢磨。

第一，他说“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政治评价，我们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笔者怀疑这里“唯心”二字，应为“违心”更符合上下文。不管是“违心”还是“唯心”，都承认党中央对毛泽东的政治评价是不实事求是的。所谓“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就是承认，这样的评价是出于政治考虑。换句话说，尽管中共领导口头上一直强调实事求是，但是在政治利益面前，实事求是甚至不在他们“照顾”的范围内。邓后面的话讲的更清楚了：“我们是错的，这错误要由我们的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换句话说，我们明知是错的，但是还要坚持错下去，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做符合我们的政治利益。这就使人们对于邓之前和之后的领导人信誓旦旦说过的那些话，什么“立党为公”，什么“三个代表”等等，不免都打上一个问号。

第二，他说“毛泽东从部署、策划，到展开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邓小平在这里实际上是说，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由此，我们可以引出这样的推论：在这个问题上，官方文章说的都是假话。例如，一九八一年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文革”发生的原因作了如下解释：“毛作为执政党领袖，极为关注党和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形成了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毛将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视为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在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阻碍，党内形成了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种说法如果是真话，邓小平上面的话就不对了。因为，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在各种会议上，在同苏共的论战的“九评”里强调的就是“党和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连普通百姓都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如果这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的话，怎么会“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呢？显而易见，邓的这几句话，否定了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毛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的说法。

第三，邓小平这段话的前后次序很有意思，他先讲了对于毛现有的评价是出于政治需要，接着似乎是突然话锋一转，讲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神秘性，然后再回到对毛的评价问题，提出要搁置十五到二十年，这对于局外的人似乎有点前言不对后语，而对于在座的陈云等高级干部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毛泽东在部署、策划，到展开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的动机和手段是对毛泽东后半生评价的中心问题，这两件事实际上是同一件事。弄清了毛发动文革的真实原因，也就解决了对毛的评价问题。而现在对毛泽东还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就是卡在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个问题不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回答。

第四，说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个问题不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回答，并不是说邓小平、陈云等人心里不知道这个答案。出席会议的五十六个高级干部，最后有五十二人都同意邓的讲话，说明他们或者是心照不宣，或者是在私下里互相交流过意见而取得了共识，都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邓说了：“我们是清醒的。”但是他们也都知道，把这个共识公布于众，对共产党将会造成极大的政治伤害，还是胡耀邦说得直率：“我们党经不起实事求是。”因此他们决定保持沉默，说要等十五、二十年，实际上就是说，要把这个秘密捂

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去。周恩来在临终时对妻子说，他心里有许多话，但不说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看来都是周的追随者。

◇ 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的钥匙

于是，这件事只好由没有出席那次会议的人来完成了。况且，邓公的上述讲话到如今也已经十九个年头了。

最近，韩钢在“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这一研究综述中就“文革”发生的原因介绍了一种不同于大多数国内研究者的观点，笔者觉得这是最值得重视的观点，因为，如上所说，“大多数国内研究者的观点”也就是官方的观点，邓小平已经说了，那些观点是“唯心的”，“搞了中庸”，“错的”。韩刚的文章说——

“……已故王若水先生就不赞同《历史问题决议》的解释，他以为那种解释只是批评毛在认识上陷入了一系列“误区”，而“文革”不是普通的错误，它错得那样荒唐，那样离谱，使人难以理解。绝不能说这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王若水先生说这不是‘判断失误’。他认为，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开始，毛想当世界共运的领袖。斯大林逝世后，活着的共产党领袖中，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与毛比。毛具备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条件，只有一点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与苏联相比。因此下了决心，向苏联挑战。但是，‘大跃进’失败了，从此毛有块心病——‘赫鲁晓夫的阴影’。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要来算这一笔账？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斯大林从神坛跌落下来，同样的命运会不会轮到自己头上呢？中国党内会不会有人学着赫鲁晓夫的榜样？这样的人可能是谁呢？六十年代他看出了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是有不同意见的，从这时起，毛开始想到用林彪换掉刘。所以，支配毛发动‘文革’的主要是他的‘赫鲁晓夫情结’。

“许多人觉得，毛泽东那样好斗，表现了他非常自信，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王认为不完全这样。毛是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结果是很糟的，正因为这样，他才那样害怕批评，那样害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的固执并不是没有看到自己的错误，而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左’的错误，为了证明这些没有错，他发动了‘反右倾’；为了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都是正确的，他发动了‘文革’；为了防止有人翻‘文革’的案，他又发动了‘批林批孔’、批《水浒》以及批邓小平。这就是说，为了证明第一个错误不是错误，就去犯第二个错误，又为了证明第二个错误不是错误，而去犯第三个错误。这样，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恶性循环，越搞越乱，终于无法收拾。

“现居美国的高文谦先生的看法与王若水先生不谋而合。高认为，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触发了他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与苏联一争高低。毛这种急于事功的乌托邦狂想和闯下大祸后，担心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追究清算他的猜疑妄想，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的灾难之路。”

王若水和高文谦都是对中共党内历史有深入了解的人，前者是通过自己作为中共高级干部的亲身经历，后者则是通过对历史档案的掌握和研究。他们的上述见解，笔者认为是给我提供了理解“文化大革命”起源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真实动机的钥匙。

湖南文革中的重要人物杨小凯在经历了造反、被囚的磨难之后，对文革爆发的原因也得出了与原先完全不同、而与王、高二人类似的结论。他于一九八六年在海外《知识份子》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一文。他在文中描绘的，不是一个有“反修防修”崇高理想因而自信心十足的毛泽东，而是一个自知理亏而恼羞成怒以致失去理

智的毛泽东：“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经济路线的彻底失败是文革爆发的直接历史原因。这一年的经济灾难是世界经济史上极罕见的。”“一九六一年，刘少奇、陶铸、周恩来这些在一九五九年积极支持毛泽东路线的人，都一致向右转，支持彭德怀的观点。……毛泽东对此怀恨在心，开始筹划反扑，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八届十中全会，到社教运动，接着又是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革命化运动、培养革命接班人、突出政治等一系列运动，毛泽东企图扭转局势的急切心情使他显得越来越没有理智。……到了文革前夕，毛泽东理亏和羞怒的心情发展到不能自控的状态，他于一九六五年注意到‘三家村’对其路线的讽刺和挖苦，而且难于忍受。从他后来‘炮打司令部’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理已完全失去了平衡。”

杨的这段话，反映了经历过文革的社会底层人士对文革的反思，同王，高的观点也是不谋而合。王若水、高文谦曾经“居庙堂之高”，对毛本人或者内部档案有直接的接触，要达到这样的认识，相对说是比较容易的，笔者相信，有着同样认识的高层人士，一定不在少数，甚至可能就是出席一九八六年七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顾委联席会议的那五十几位高干的“共识”，只是因为党的政治利益，他们宁愿把真相带进坟墓。王，高二人令人尊敬之处是有勇气公开自己的认识，为后人留下他们的真知灼见。至于“处江湖之远”的学生和一般社会人士，则要在文革的“大风大浪中”经历一番沉浮才或许可能与他们殊途而同归。因为他们不知道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庐山会议和大饥荒的真实历史，尽管这是刚刚过去几年的历史。他们只知道“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这种将真事隐去的“历史”，必须根据自身的经历和社会的现实，经过一番分析思考才能看穿假冒历史的迷雾。

◇ 无知者斗争明白人

邓小平在本文开头的那一段讲话中说，他们大多数人对于毛泽东展开文化大革命要达到的目标是不知的。这话恐怕也未必完全坦白。他们跟着毛泽东几十年一路走来，他有什么心思，难道一点都没有察觉吗？如果说，发动大跃进的早期，党内高级干部还看不出毛的心思，那么到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他毫无根据地给彭德怀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在场的人难道对于毛的心思还不心领神会吗？事实上，王若水先生就曾在一篇较早的探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文章（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中提到过这样的事：早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到处鼓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举了历史上许多例子来说明后来者居上、年轻人超过老年人的道理，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就写了一篇题为“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文章投给创办不久的《红旗》杂志，由于“超过马克思”的提法过于新颖大胆，未被采用。这说明在当时“领悟力”较高的干部已经猜到了毛泽东这些话背后的用意。笔者记得在文革中七机部造反派头头叶正光（叶挺之子）揭发其养父聂荣臻的大字报中曾经提到，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几位老帅在聂家聚会，为彭德怀的遭遇“抱头痛哭”。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看穿了毛泽东的私心之后的绝望。五八年时，党内有很多高级干部都跟随毛泽东积极鼓吹“大跃进”，但经历了后来的失败，到六十年代初他们的态度就不同了，在第一线工作的邓小平，据毛泽东后来对他的批评，耳朵聋，开会时却坐得远远的，可见他也要跟毛泽东保持距离了。但是，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周恩来、彭真都在中苏论战中旗帜鲜明、毫不妥协，说明他们当时对毛泽东的心理有了相当准确的把握，知道大跃进失败使得毛泽东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梦想破灭，反而招来赫鲁晓夫“喝大锅清水汤”的讥讽，这是毛泽东的最大心病，一根绝对触动不得的神经。别的事还可以躲着点，甚至作点小小的补救，在“反对修正主义”这一点上，是绝对不能表现出丝毫含糊的。

文革后平反、复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自己或由子女、秘书撰写的回忆录里，无不把他们写成一派天真无邪的样子，仿佛当年跟着毛泽东犯错误都是因为“盲目追随左倾”路线，毛泽东整到自己头上也懵然无知，死到临头还是那么“相信群众相信党”。果

真是这样吗？光凭靠着这一片“愚忠”他们能在几十年的党内斗争中生存这么长久吗？依笔者之见，揣摩毛泽东的心思，或者说“细心领会主席思想”，是在毛泽东一朝为官的基本生存技能，忠奸之别只在于，那些党史上的“反派角色”，林彪、康生、四人帮摸清了毛的心思之后，从中看到了自己进身的机会，知道怎样逢君之恶，以实现自己的野心，而其余的人则是从“三年自然灾害”看清了毛的私心和危害，心中尚存未泯的良知或出于对史笔的畏惧，不想紧跟又要装出紧跟的样子，只能小心谨慎，以求“保持革命晚节”，不要被出而反面的毛泽东淘汰出局。

应该说，到文革开始发动的时候，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于毛泽东近十几年内的思想走向是清楚的，因而对于毛泽东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它背后的原因实际上是明白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文革中号召群众斗“走资派”（尤其是中央一级的走资派）就是教唆昧于历史的人去斗争那些了解历史稍多的明白人，尽管这些明白人战战兢兢，没有一个有勇气把自己对“主席思想”的领会公之于众，毛泽东还是不放心的。毛泽东的这种整人办法是一贯的。他在延安整风时期，清算王明、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等人在江西苏区时期的“错误路线”，起用的人就是彭真、高岗这些没有经历过南方斗争，不了解那一段时期的历史、从而同毛没有分歧恩怨的人。陈毅在“二月逆流”中说的一段话点出了这一真相——陈毅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这是陈毅在气愤中说的话，口不择言，不是完全正确，比如他说刘邓“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不过意思是清楚的，那就是彭、薄这些北方局的干部，“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所以“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到了五、六十年代，彭、薄等人“见毛主席”时间长了，对毛有了近距离的观察，拥护毛泽东思想就不如当年起劲了，甚至看透了毛的私心和荒唐，于是就落到了王明、周恩来、陈毅等人当年在延安的地位。这时又有一批“没有见过毛主席”的人成长起来了，他们中上有张春桥、姚文元、王、关、戚，下有红卫兵、造反派。从延安开始（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毛就是这样利用一茬又一茬的“没有见过毛主席”的不明历史真相的“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的人，整那些跟他长期共事从而了解他真实思想并同他发生意见分歧的人。这个策略直到文革后期才开始失效，尤其是林彪出走事件以后，明白人越来越多，最后导致了七六年的“四五运动”。

◇ 一九五五年的“五月变化”

由于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一直是主宰中国政治的中心人物，王若水对于毛泽东的心理分析，不仅为我们理解“文化大革命”起源，也为我们理解五十年代直到文革的整个历史时期提供了一把钥匙。他和高文谦为我们理清了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思想走向：斯大林逝世后，毛自认世界共运的领袖就轮到他了，只有一点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与苏联相比。因此下决心搞“大跃进”，名为“超英赶美”，实际上是要超过苏联。但是，从斯大林之死到大跃进的发动，中间有五年时间，本文试图跟踪这五年里毛泽东的言行，以期弄清他在这一时期里思想的变化。

分析毛泽东一生，尤其是晚年的言论可以看出，毛泽东属于那种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犯了错误死不认错的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人，在斯大林死后，产生自以为有资格领导国际共运的企图心是很自然的，但是把这种想法付诸行动，这中间有个过程。王若水以及其他论者指出了毛发动“大跃进”以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同斯大林之死这两件事之间的相关性。他们没有提到的是，斯大林死后的中国不仅在“生产力”方面落后苏联甚远，而且在“生产关系”方面也差得远——五十年代初，大部分农村都处于单干和互助组状态，城里还有许多私人企业。信奉马列主义的人对于所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至少是同样重视的，他们认为两者共同构

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生产关系的变革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作为一个经济基础落后的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要想能够领导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他最着急的事就是迅速改变生产关系，然后迅速实现工业化。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理解他为什么那么不顾一切地搞“大跃进”，而且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早在搞“大跃进”之前就同样急切地掀起“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关于这一段历史，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回顾，他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转折点，就是1955年夏党内开展的对所谓‘小脚女人走路’的批判。”

根据薄的回忆，在斯大林死之前的1953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讲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同志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自己定的时间表，虽然已经够激进的了，也准备花“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也就是说，要到六十年代中后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据薄在书中说，这个进度是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而且得到赞同的。中共中央在1954年2月10日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批准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是这么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个时间表，是毛泽东自己定的，又有斯大林的首肯，而且经过中央全会的正式批准。全党上下满以为可以成为今后至少十年工作的指导方针。他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在一、二年的时间内有了“新的思路”。本来根据这张时间表，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到1957年争取全国三分之一的农户加入合作社。1955年6月14日，中央政治局在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上制定了在1956年秋收前达到100万个合作社的指标，可是六月下旬，毛从视察归来，嫌它太慢，就把它推翻了，提出要比现有的数目翻一番，达到130万个。一个月后，他在1955年7月31日向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作了一个“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式定下了批判“小脚女人走路”的基调。“会后批判不断加温，到十月的七届六中全会和随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出版而达到高潮，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股空气：谁不跑步前进，谁就是‘小脚女人走路’。这不仅推动了农业合作化的急速前进，也推动了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前进和1956年经济发展速度的冒进。”结果，1955年年底，全国便有60%农户入社，1956年十月，多数省市全部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在城市里，原来规定到1957年底，私营工业大部分，商业一半以上实行公私合营或合作化。但是在农业合作化的推动下，1956年一月底，全国大中城市就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也就是说，原定十年到十五年完成的事，毛泽东在五五年夏天决定加快进度，到1956年秋天就全部完成了。

看得出来，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的考虑，在1955年的年中发生了一次“飞跃”，突然之间急切到了自己不久前说过的话可以不算数，党的领导集体通过的决议可以推翻的程度。毛泽东在那一段时间里推动社会主义改造急速前进的热情，一点也不亚于他后来推动“大跃进”的那份劲头。人们现在经常谈到毛泽东为了排除大跃进的阻力，给“反冒进”的周恩来扣上“跟右派相距五十米远”的帽子的做法。其实早在1955年他就斥责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给他扣上了“小脚女人”的帽子。至于他在一九五八年的年中突然把当年钢产量指标比前一年翻

一番达到1070万吨的荒唐决定，也同他在1955年年中坚持要把当年合作社数量指标翻一番的决定如出一辙。

毛泽东的思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突然的变化呢？薄一波说：“这些年来，有些历史研究著作中把这称为‘五月变化’，但都尚未涉及或说不清导致变化的原因，弄清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研究这段历史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薄本人对此所提出的“分析和推测”，是认为毛在1955年四、五月外出视察期间，对农业生产形势产生了乐观的估计，导致了毛的激进决策。显然这里薄一波是以最良好的善意来推测毛泽东，或者说是薄出于“党性”维护毛泽东一种说辞，这种“分析”企图把毛的错误归结为认识上的问题，而且归罪于地方干部的不实汇报和虚夸。显然，这是经不住起码的推敲的，用邓小平的说法，“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因为在1955年那两个月中，无论查当年的历史记载，还是薄一波本人的叙述，都没有能够找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以致使得毛泽东在视察中看出农村的形势好到了原来需要十五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事，可以在十五个月内完成。这样大的变化，同毛后来的一系列错误一样，显得那样荒唐离谱，不是一般的“乐观估计”能够解释的，非常的变化是需要用非常的原因来解释的。

那么，毛泽东本人是怎么说的呢？据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说，他之所以要大大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是因为看到了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是这所谓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什么党中央和农村工作部都没有发现，而他毛泽东下去一两个月的视察就突然发现了？毛泽东所谓的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从诸如“三条驴腿办社”、“穷棒子社”这样一些材料中得出来的。其实，贫苦农民合伙共同拥有牲口，互相之间“变工”历来就有，并非新生事物，更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另一方面，他对更多的反映农民抵制集体化或者农民缺乏组织集体生产经验的材料却视而不见。他的说法是：“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这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逻辑才真是奇谈怪论。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付彭德怀和张闻天等人的批评的辩解，就是说他们“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大跃进中的问题是“一个指头”，不能否定九个指头的成绩。可是，早在1955年，他毛泽东却可以用“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去压倒一切主张合作化缓行的论据。

可见，毛泽东自己的说辞也无非是一种论战的手段，并不是他的真正想法。看来，所谓“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不蕴藏在农民之中，而就蕴藏在他自己的心中，而且是不能公开说出来的：那就是自从斯大林逝世，毛泽东经过两年时间的观察，从苏共内部剪除贝利亚以及马林科夫下降、赫鲁晓夫上升等一系列变动，看到了苏共新领导尚未站稳脚跟，因而在国际共运的领导问题上有了“彼可取而代之”的机会。但是从机会变成现实，毛泽东知道自己面临着若干不利条件，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固然落后，其实还是次要的，最要命的是，中国当时还谈不上是个马列主义所定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按当时的理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工人都在国营企业里工作，农民都在集体农庄里劳动，至少也要在合作社里劳动。周恩来在1953年九月八日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这样定义社会主义：“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而当时的中国现实离这个标准相去甚远，是一目了然的。所以周恩来紧接着又说了：“完成这个任务要经过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一个还远远算不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怎么能领导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呢？这大概是那一段时间里最令毛烦恼的问题了。在1955年五、六月间，毛泽东还干了另一件让人“紧跟不上”的事：他把同周扬等人展开文艺理论论战的胡风一举定为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当时有这么一件“轶事”：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包括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由于编排上的疏忽，这个发表的自我批判不是最新的第三稿，而是较早的第二稿，当周扬向毛泽东反映这件事时，毛

泽东的回答是：“什么二稿三稿，胡风都成了反革命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毛泽东的不耐烦的心情。胡风案平反以后，包括胡风的论敌周扬在内的人们都表示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当年毫无根据地突然把胡风问题一下子上纲到“反革命集团”的高度，如果我们联系当时他的心情和正在殚精竭虑思考的问题，或许可以获得一些启示。

毛泽东是一个不肯向现实低头的人，他是那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人，打败国民党的战争出乎意外的顺利助长了毛泽东的这种心理。连斯大林都没有他看得准，当初还劝他隔江而治——这可能让他昏昏然觉得自己有着“心想事成”的“天命”。如果按原先中共领导人的共识，要经过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实现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到时即使目标达到，苏联领导人也已经站稳脚跟，而自己却已经年逾古稀，又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战胜法西斯的功业，国际共运的领袖之梦怕是难圆了。这样的考虑，给了毛泽东一种“时不予我”的紧迫感。“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因此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他决定采取第一个行动了，就是一改过去那种“小脚女人走路”的方式，加速推进农村合作化运动。这就是薄一波说的“五月变化”。

到一九五六年秋天，真的是只用了十五个月的时间，中国城乡全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样短期内发生的剧烈的社会变动，其负面后果一时还未能完全显示出来，毛泽东却以为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英明”，他当时说，看到千百万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比三大战役的胜利还要高兴。他当然高兴，在通往国际共运领袖的道路上，第一道重大障碍竟然如此轻松就跨过去了。于是不出两年，又掀起一场新的运动，把高级合作社提高到比苏联集体农庄还要“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这段时间里始终以苏联为攀比对象，在生产资料公有化方面不超过苏联决不罢休的心理。

在这同时，毛泽东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加速生产力的发展上，这就是他在一九五八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这方面王若水和高文谦先生，以及其他许多研究者，已经有较为详细的研究和论述。笔者想要补充指出的是，后来在“三年困难时期”发生的饥荒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严重后果，不仅肇源于“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更早应追溯到一九五五年的强行推进合作化运动。而其源盖出于毛泽东急于提升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和生产力，以取得争取国际共运领导权的资格。

如果把“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一心路历程比作一条河流，那么它的源头应该是在1953年。根据李普先生最近在“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节目中，1953年，他调到了中宣部，这时候，他听到传达：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两个月之后，1953年8月，毛泽东做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批示，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李普看来，新中国历史上走的“左倾”弯路就是从1953年过早放弃新民主主义道路这件事情开始的，此后的中国，并没有执行建国初期政协会议拟定的蓝图，而是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整整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斯大林逝世之后几个月毛泽东就发下了这样的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批示，现在看来，并非巧合，说明他已经早早在做准备了。不过那时还只是流淌在地下的“暗河”，到了1955年，这条河就露出地面，奔腾而下，到了1958年，就成了泛滥的洪峰，冲决一切堤坝。这才是造成“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导致后来“十年浩劫”的真正原因。

◇ 假如斯大林多活十年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心中叹息：毛泽东这股狂奔进入共产主义的祸水，在中国早已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全党莫之能御。环顾全球，能够挡得住他的唯斯大林一人耳！可惜斯大林已经不在人世，假如他老人家晚死十年，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必定会大不一样。屈指算起

来，斯大林生于1879年，假如晚死十年，1963年去世，也就是八十四岁，不能算是特别高龄，所以这个假设不算荒唐。当然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这样的假想只是面对几千万冤死的亡灵聊以自慰而已。

首先，斯大林的存在，本身对毛泽东就是一种制约。政治领袖之成为领袖，常常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同常人的野心或者说雄心，以及坚持己见的坚定性，这本来是也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问题在于领袖有没有约束。说起来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悲哀，自己的领袖自己却没有能力约束，要靠外国的领袖加以约束，然而那确是当时中国的现实。自从毛泽东这轮“红太阳”通过延安整风升起，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他在中国共产党内就摆脱了一切约束，使得他在后来的加快合作化进程以及大跃进等一系列决策中，可以置集体领导的意见、党中央的决议于不顾，随心所欲地规定和改变各种指标，说他是冲决一切堤坝的洪水一点都不过分，邓子恢、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没有一个人挡得住他。因为他有党中央内部授予的“最后决定之权”，而且动辄用“重上井冈山”的威胁来劫持整个党中央不得不跟着他走。唯一能够对他制约的就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可惜这种制约的效果太慢，等到这种制约发挥作用，中国人民已经为此付出了空前惨重的代价——几千万人已经成了饿殍。如果斯大林还活着，情况就会改观。毛泽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心情就不会如此急切。我们知道，毛泽东对斯大林以及整个共产国际的领导是有一肚子怨气的，而且觉得他们都不如自己高明，尤其是他第一次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对他说了“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一类的话，让毛的这后一种心理更得到了加强。不过同样可以肯定，毛泽东是不敢同他争夺领导地位的，恐怕连这种想法都不会有——婆婆还在世，是轮不到媳妇当家的。毕竟，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在整个东欧地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甚至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离不开苏联的援助。这样的功业是没有人能同他比的。毛泽东虽然自以为比斯大林高明，最多也只能在自己的党内说说，拿到国际上去是不会有人相信的，这点自知之明毛泽东还是有的。

其次，即使毛泽东还要加速社会主义改造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斯大林也不会同意他的荒唐计划。就说关于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中国共产党原来提出的十年到十五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是参考了苏联的经验，而且由刘少奇当面向斯大林报告并获得认可的。毛泽东要改变这样的进度，中共党内固然没有人挡得住他，斯大林的关多半过不了：苏联也花了十几年才完成合作化，其间发生过农民的抵抗和饥荒，农业生产水平也没有改善，斯大林没有理由相信中国可以用短得多的时间比他做得更好。至于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显然更不会得到斯大林的同意。斯大林固然有大国沙文主义，但是眼看毛泽东完全不顾客观条件，以空想为基础制定计划和指标，大概不至于坐视他把中国引上灾难之路。同毛泽东比起来，斯大林在经济建设上还算是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科学的，使得苏联建立了良好的工业体系，为后来打败德国法西斯提供了实力基础。只要斯大林出面阻止毛泽东的胡作非为，毛泽东是不会不买他账的。这从刘少奇在1949年6—8月秘密访苏期间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

总之，斯大林假如多活十年，几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将会是另一种样子，至少，成千万的中国农民不致死于饥荒，成千万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不致遭受“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成千万的城市人口也不会在青少年时期失去学习的机会被送到农村去。最后，斯大林晚死十年，对毛泽东本人实在也是一大幸事——毛泽东在斯大林死后肆意妄为，作出一连串荒唐离谱的错误决策，同他在夺取政权前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判若两人，究其原因就是没有了约

束：先是没有了蒋介石这个约束，然后是没有了斯大林这个约束，他真的成了“无法无天”的人，一旦进入了这样的“自由王国”，史书也就替他准备好了千古骂名——刘少奇在1962年告诉他：“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如果当初老夭对斯大林这个“婆婆”假以天年，毛泽东这个“媳妇”眼看没有希望熬出头，索性收起争霸国际的雄心，安下心来把自己家里的事情做好，成就了他一代开国明君的英名也未可知。

□ 原载《华夏快递》2005年8月27日

~~~~~

# 【亲历者言】

## 徐家汇教堂蒙难记

• 于吉星 •

1966年8月23日，这是“文革”中一个特别疯狂的日子。那天，一场声势浩大的“破四旧”，把徐家汇天主堂变成了地狱。我从头到尾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绝人寰的暴行，至今历历在目。

当时，我是上海师院（今上海师大）附中66届高中毕业生，住在师大校园内的家属宿舍里……

记得那天早锻炼刚开始，突然“叭”——“叭”——“叭”，一阵急促刺耳的喇叭声响彻校园，只见一辆大卡车直闯进来，停在教学大楼前，后面紧跟一辆小面包车。我马上跑过去看看，只见面包车上下来几个穿军服的北京红卫兵，其中一个剪短发的女红卫兵，对着已经聚集在那里的师院红卫兵说道，红卫兵的使命是“用革命的暴力手段砸烂旧世界，消灭阶级敌人，保卫红色政权，”徐家汇天主教堂是帝国主义留在上海的最大反革命阵营，所以必须砸烂，决不能手软……一听要砸徐家汇天主堂，我大吃一惊。看着师院红卫兵一个个上了车，我也紧随着跳上了车。

上车后才知道，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院的红卫兵已在昨天和徐家汇附近的上海交通电器厂、上无四厂等工厂的造反派商定，决定今天对徐家汇天主堂开刀。这是当天上海破“四旧”的重要行动，必须成功。当时交大、师院两校红卫兵大多去北京见毛主席了，留校的不多。因此，我这个高中毕业的逍遥派很容易混进车里，当一名无袖章的临时“红卫兵”。

大卡车很快就开到了教堂正门前的大通道上……一群比我们早到的上海交通电器厂等单位的造反派迎接了红卫兵。远处还有几个像记者的拿着方框相机对着群众摄影。一位工人高呼：“向红卫兵小将致敬！”车上的红卫兵回应：“向工人阶级学习！”接着，大家一起高呼：“砸烂唯心的天主教堂！”“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现场响起一片鼓掌声。

唯一没有呼口号鼓掌的是被赶出教堂的神职人员，他们有五十多人，有男有女，都畏畏缩缩站在教堂大门前，灰溜溜地不知所为。前面几个低头弯腰双目无神……

红卫兵下车后，一个自称区政府造反派的首先介绍情况：这批神职人员是经过1951、1953、1955、1958年四次对宗教界清洗后，最后留下的所谓爱国人士，他们断绝与梵蒂冈的联系，表面上拥护毛主席……今天要他们看看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刚刚到的师院红卫兵领头的插上说：“这说明这里阶级斗争形势非常非常严重，阶级敌人非常非常凶狠狡猾，今天一定要把这些毒蛇揪出来铲除掉！”

接着，红卫兵把准备好的浆糊桶，大幅小幅的标语，大小红旗等搬到教堂中间紧闭的大门处。不一会，中间墙上贴出大标语：“彻底清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行”，两扇大门上也贴出“不许宣扬唯心主义”等标语。贴完标语后，工人造反派把十米高的消防竹梯，搭在教堂中央正门上方的耶稣立雕像处……一个体格强健的造反派工人，穿着红背心，手拿铁锤，通过消防竹梯爬到耶稣圣像脚边，开始用铁锤猛敲耶稣圣像和铁十字架，下面所有人都抬头望着这个红背心的动作。由于耶稣圣像筋骨结构太坚硬，没成功。接着又有两个工人，头戴藤帽手拿工具爬上竹梯，帮助红背心一起敲打。三人敲打了一段时间，终于把耶稣圣像扶握的铁十字架卸了下来。

上面的工人在敲打时，下面的红卫兵也在忙碌着，他们按照工人测量的尺寸，用带来的大白铅画纸给圣像做了顶一米多高的帽子，写了“牛鬼蛇神”四个大字，套在耶稣圣像上。同时又在大门两边大柱上帖起两幅对称的大标语：“砸烂天主教堂”，“打倒唯心主义”。

一切准备就绪后，声讨神职人员的斗争会开始了。红卫兵给站在最前排的8人都戴上“牛鬼蛇神”的高帽子，并在胸前挂上写有姓名的木牌，背后贴着写有职称的大白纸。我记得中间三人是核心人物：“张家树主教”“李光明神父”“陆薇读天主教爱国会主任”。他们虽然低头弯腰，但显得很平静，没有一丝畏惧和愤怒，好像若无其事。身后是低头弯腰的教徒修女们。工人造反派、红卫兵对他们轮流批判，同时反复呼叫革命口号。我站在人群后，右手拿着师院红卫兵发给我的小红旗（上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跟着大家一次又一次把红旗伸向天空……

之后是两个半小时多的游街示众。为了加大对核心人物的人格侮辱，特别在他们反绑的双手上再系上一条草绳，由后面红卫兵牵着。喊口号举大旗的走在两侧，我拿着小标语旗子，走在游行队伍中间，途经漕溪北路、衡山路、华山路、徐光启墓区等，沿路反复呼喊：“砸烂徐家汇天主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口号声浪震撼周围大街小巷，不一会引来四面八方的人群，人群中有人把垃圾扔向戴着半米高帽子的“牛鬼蛇神”。更激进的，是冲上前踢上几脚，再吐上几口痰。还有更甚者……当游街队伍刚过徐光启墓区时，一个四十出头、身强力壮的男人，冲进游行队伍里细看挂牌，当看到主教张家树的时候，突然激动起来……紧接着拳打脚踢，似路见仇人。要不是我和另外两个红卫兵强行把他拖开，张主教也许会被打死，因为他一下被打得跪地而倒，鼻子和嘴巴在流血，高帽子被抛，胸前的木牌被打成两半，一半掉在地上，另一半还搭在脖子上。“凶手”握着肿大的血手，说道：“要不是那块木牌，我早就结果了他……”

中午时分，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增援的各中学红卫兵，各大小工厂的革命组织，以及看热闹的群众已把天主堂围得水泄不通。大家挥舞着自己组织的红旗标语，高呼革命口号，声浪此起彼伏，犹如千军万马杀到斗牛场，整个天主教堂成了被困的红牛。

“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远处高音大喇叭重复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曲。短短几小时，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穿红背心的和另几个工人的猛敲猛击，四圣像已全被砸毁。正面的大耶稣雕像已被巨幅毛主席标准像挡在后面，下方贴上了红色标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边上高音大喇叭和插满了的红旗。整个天主堂墙上到处贴满标语，大字报层层叠叠，语气激励；最醒目的是：“热烈支持上海电机厂的革命建议砸毁十字架！”“热烈支持上海师院红卫兵的革命行动铲除天主堂！”……

教堂前的广场上燃起了一个大火堆，造反派正在焚烧从教堂里搬出的圣品和文物，刚才被游斗的“牛鬼蛇神”们都跪在一旁。我用力挤过去看，刚才那8个戴高帽子的现在只留下6个了，他们成了比捡垃圾的还脏的人，身上除了垃圾还粘满痰液，一些新痰液正从高帽子边头发上流到被打肿的脸上，混合了汗水发出呕心的臭味。我别扭地弯下腰细细观看，因为新增加的暴力所产生的恐惧，使他们的脸扭曲得无法认出，有的瞳孔已扩大，眼珠死巴巴地盯着地上，就像快要死的人，长时间肉体的摧残折磨已使他们快坚持不住了。

有一人腿在流血，我本能地问是谁打的？马上有人搭话：“是个北京女红卫兵用皮带抽的。”“好人打坏人，活该。”“有一个人被打伤已经拖走了。”我问道：“是谁？”有人回答：“他的木牌写着‘李光明’，他把高帽子拿掉擦去粘满的痰液，被北京红卫兵发现，于是被戴上吐痰的痰盂，他又拿掉，于是就被用那铜痰盂打晕了。”……突然，我看到跪着的神职人员中有一人躺倒在地上，快要死了，我马上过去看看，人群中马上又七嘴八舌起来：“他是装死”，“天主教是鸦片，谁叫他去吃的”。然而，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这个瘦得皮包骨头的修士竟是个盲人，虚弱的身体被折磨得快没有心跳了，我毫不费劲就把他抱起来，又禁不住对着围观的人群喝道：“他是瞎子！你们也是瞎子？”很快，人群中挤过来两个妇女帮助我照顾这修士。

……

绕过一个翻倒的“告解亭”，我沿着墙进去。一些人头戴藤帽，正在用手持的长木棍、短铁杆捅向铜丝镶嵌成耶稣圣像的彩色玻璃窗……远处几个工人和一群红卫兵在争吵，工人说不要砸毁与宗教仪式无关的一般玻璃窗，但红卫兵说革命要彻底，决不要手软。于是，噼里啪啦、稀里哗啦，教堂内所有玻璃都变成了碎片……

还有一些人手持铁工具，砸毁大堂中央大祭台和两旁对称的近20个小祭台上的每件宗教物品……在这些人的手里，没几分钟就成了一堆废料。能焚烧的就扔进广场上的火堆里，不能烧的就地砸毁，以前铺满漂亮花瓷砖与青砖组合的地面上，出现了一道道新裂痕，上面撒满了无价之宝的残骸……

一个捂着手的红卫兵小头目急匆匆从楼梯上下来，他因砸门锁伤了手而找纱布，他叫我去楼上储藏室帮忙。我赶过去时看到一群工人造反派正在拆除管风琴……曾经闻名东南亚，也是徐家汇天主堂的镇馆之宝。我看到满地的铜螺丝，又听到拆除时发出的“呜呜哇哇”声音……

我在楼上找到那间储藏室，房间一半整齐地放满了一包包神品和一捆捆宗教书籍，上面都有日期，多是1955年、1958年从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上缴和没收来的。另一边整齐放着大小不同的箱子，细看，每个箱子都有统一编号、标签和封贴，有外文或中文说明，箱子主人情况，并标明年月日，大多是1949年4月底5月初的……我正看得入神，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问我在干什么？我转过身，看到一个戴着眼镜的凶相红卫兵，他那双眼睛爆满了血丝，哎呀，是上海师院红卫兵的头儿。我马上拎起一个大箱子说道，这个特别重，就我一个人来拿吧。说着拎起箱子下楼，没想到这箱子特别重，两个人拿也很吃力。我一个人将它搬到门口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总算有两个造反派过来代我拖到火堆旁边，他们撬开箱子，不管什么统统往火里仍。

我抬头回望，正面教堂顶上的红砖墙上，巨幅毛主席标准像已移到北侧，中间的耶稣圣像又出现了，那个穿红背心的工人又站在耶稣圣像的手肘上，下面两个工人将粗绳递给他，他把粗绳套在耶稣圣像脖子上，刚才帮我拖箱子的造反派叫了一些群众也去帮忙……



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上午不知做什么好，对徐家汇教堂的牵挂，又让我回到这里。与昨天相比，这里安静多了，广场上到处是乱七八糟的废纸、书籍和杂物。新的一群人手拿长棍短棒，翻来覆去寻宝。中央一大堆火灰还在吐出火舌，吞噬着新扔进的书籍，烧得精光只剩金属架子的圣龕躺在中间，边上堆着继续烧的书籍杂物等。几个红卫兵守着火堆和大门，大门上的红墙中真的没了耶稣圣像，取而代之的是毛主席的巨幅标准像。……我开始在广场上到处找被拆除的耶稣圣像，可怎么也找不到。问红卫兵，他们说是上午刚来接班的，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上午来了几辆公安局的车，把昨天被批斗了一天，今早都躺倒在地上的教堂神职人士，统统送提篮桥（监狱）了。

我决定进教堂里找找。到大门口，第一眼就看到墙壁边堆放的书籍和杂物，大多是楼上搬下来的，看来再烧一天一夜也烧不完。长凳上横睡着几个熟悉的身影，走近一看，就是昨天给耶稣圣像上套粗绳的红背心和同伴，旁边放着新拿来的工具。他们正在打呼噜……教堂里和外面一样，也全是废纸、书籍和杂物，伤痕累累的大小祭台上，空空荡荡。但教堂内依然有很多烁烁耀眼的色彩，那是被毁坏的物品残骸，依然发着光……没有了玻璃窗的教堂，一眼望去看不到一样完整东西，只看到南门墙边有人站着，我以为发生什么事了，过去一看一个造反派正对着盛水的圣水盆小便……听到声音他回头一看是我，就一边说“啊是你”，一边又尿了。他就是昨晚帮我拖箱子的造反派。我接着问他：“昨天拉下的耶稣圣像呢？”他说：“圣像太牢根本拉不下，后是用电动工具钻洞一块块砸下的，现扔在最南边树丛里。”他还说，今天一早上面的精神（指示）又来了，说上海的天空不准有十字架，他们本来准备弄掉四周墙顶的怪兽（滴水兽），但没站脚的地方，弄不好会出人命，于是赶紧先把三个十字架弄掉。我说不是只有两个吗？他指着大祭祀台上的房顶，没等他开口，我一下明白了……出了教堂，我加快步伐跑到南边树丛，找到了被五马分尸的耶稣圣像。第一次这么近看被伤害的耶稣头像……

□ 节选自《民间影像》第四辑

~~~~~  
【跌宕人生】

走出困沌——我的文革经历实录（下）

• 江明德 •

（上接 z k 1 8 1 1 c）

（六）陕南岁月

1，雨雪兼程

1968年12月27日离京赴西安，午夜途经安阳，同年级6264的张一平到安阳火车站接送，算是同学一场最后送别。28日上午细雨中抵达西安，去省革委会换至安康地区革委会的派遣证。下午到小南关长途客运站询问去往安康的长途客车班次，得知因安康两派武斗长途客运已中断数月。近日客运始通，暂用敞篷卡车载客。29日晨乘解放卡车赴安康，一路朔风雪粒扑面。秦岭之上道路两边冰凌树挂，电线杆上铁丝敷冰犹如铁锹柄一般粗细。当日夜宿宁陕。次日下午卡车快到安康，于汉水之北隔江相望，惨烈派性武斗后的安康城，远远望去一片焦黑。30日抵安康，31日改派遣证去平利县。1969年元月1日凌晨

晨，乘安康至平利长途班车，于风雪之中到达大学毕业分配终点站陕西省平利县，同日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2，平利只有三个电

到县革委下放办报到的时候，关于工作分配工作人员说，你是学无线电的，我们平利跟电有关系的单位只有三家。水电站、邮电局、广播站，你就去广播站吧。分配工作的介绍信上明明白白写着：先当工人，劳动锻炼一年。

这样，我和其他几位来自西安和上海的大学生们在县委招待所先安顿住了下来。期间还被临时编入县革委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宣传元旦社论“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干了将近半个月。

从乡下回到县上时，在县委招待所等着我的是平利广播站的工人们。他们早早的得到消息说有一个北京大学生分到他们站上。

平利县有线广播站是一个不足二十人的县级小单位，从来没有分配过大学生来。架线队的工人们一听说县上分来个大学生还是北京中国科大的真是喜不自禁。一群人把我接到站上，先是安排宿舍、找条凳门板支床铺，接着带我到仓库领工作服、工具包和爬电线杆用的脚扣、安全带。不一会就把我变成了在平利县城关镇居有定所全副武装的广播架线工人了。

3，那年没有过春节

刚到平利县城那天早晨，我和另几位来自西安、上海的大学生从县革委开了工作介绍信出来沿着县政府门前的大街往东走，逛了大半个县城，出东关向南找到县委招待所安排了临时住处。前面说到69年元旦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我在去到平利广播站安排工作之前那一段参加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工作的经历就和这篇社论有关。

住到招待所的第二天，县革委来人召集所有新来大学生开会，部署了立刻参加宣传元旦社论的下乡任务。大学生分散编入各行业口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任务是宣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口号是“狠抓阶级斗争，促春耕”。我被编入卫生口的县医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是一位姓李的主治医生、县上有名的造反派头头。我们下乡的地点是魏汝区清泰公社，地处巴山山脉女娲山腹地。记得我和前县医院院长分在一个组，我很惊奇当时已经被打成“走资派”下台了的他还可以充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当组长，我当时的理解是为了给他改错锻炼的机会。院长表现很“左”，可能出于积极悔过自新的心态。有一次开生产队大会批斗几个地富分子，院长主持会议讲到激动处喝令被斗的人“跪下”。我马上制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许体罚”。他反驳我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立刻回应道：“不许跪下，共产党不讲迷信！”到底我是来自北京的大学生、首都的红卫兵，“走资派”即使当了组长也只有屈居下风最终作罢了。

再有就是记得山里老乡见我是个年轻学生又是从北京来的，总是爱充当媒婆角色给我说对象。每遇到这种场合，那个院长倒是很配合，连忙挡驾说，别看人家面相嫩，江同志早已是当爹的人啦。在陌生一群人中及时给我解围，我很感激。

那年的春节究竟怎么过的，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天天跑来跑去，白天黑夜开会，究竟干了什么、起到什么作用，也是脑子里一盆浆糊。

4，我犯错误队长挨批

到广播站安顿下来没过几天，我就和线务组的工人们“出任务”了。县政府院内高杆子上的3只高音喇叭有两只音圈坏了，需要取下来修理。我背着工具包，跟着工人们来到架设高音喇叭的院子。仰面看用多节线杆竖起的高杆顶端东、西、南朝向各有一只25瓦高音喇叭，为了稳固高杆的中间打了两层三角拉线。走到高杆子底下，我问工人登上线杆脚扣怎么使用，有位工人拿起脚扣往线杆上一套，把脚登往下用力一按脚扣牙齿深深嵌进木杆。我说能试试吗，工人说可以啊。于是我双手伸直抱着线杆，脚踩住围在木柱上的一双脚扣登子，弯腰用手拉紧脚扣的皮带，只听到电线杆子木质发出“吱吱”的声音，看见脚扣铁齿更深的咬进木质。我试着向上攀爬了两步，问“是这样爬杆子吗”？工人回答：是的呀，没错。随后的动作我没有控制住自己，也出乎大家的预料。接着我就左一脚右一脚，一步一步的踩着脚扣登高直到爬至离地二十多米的高杆顶端。下面是工人们不停的喊声：快下来，你没有系安全带，危险！到达顶端的我这才发现对于25瓦喇叭的高音头我一无所知。好在我学无线电，电子器件可以触类旁通。在下面工人师傅的指导下，我卸下高音头放在工具包里就准备往下走了。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要知道上登为实下撤为虚。朝下走时感觉到脚扣总是咬不住木杆，越是踩不稳木杆双手越是抱紧杆子，而人体越是离木杆靠近越是踩不稳脚扣，这个恶性循环是十分危险的。工人们看见了赶紧在下面指导：双手伸直兜住电线杆，身体离开杆子，踩稳了下一步再松上面的脚扣。听了工人的指导，脚扣踩的稳多了。谢天谢地总算一步步下撤一直捱到双脚落地。我累的一身汗水，工人们也是紧张的一头汗水。事情还没有完，回到站上站领导小组负责人听说了整个过程之后，把同去的线务组副队长骂了个狗血喷头：人家青年大学生不知道危险，你一个专业架线的也不知道操作规程吗？我连忙自己承担错误说，不怪工人师傅们，是我太冒失，今后注意向工人同志学习，遵守操作规程。

5，副帅偷了三只鸡

第一年的架线劳动锻炼对于好动的我来说有趣而新奇。下乡看到不少山区的稀罕事也学到了栽杆架线的本领，重要的是我和线务组的架线工人们建立了可以称兄道弟的亲密友谊。山区的人梗直坦率、容易相处，很对我的性格。

波澜不兴的生活终究要归于平淡，而文革运动看似平淡的水面居然还潜藏着一股汹涌的逆流。此话是从一则流传民间的俚语说起的。据说有公社传达县上下来的文件讲到了林彪副统帅，某社员在会议室外隔着玻璃听得不够真切，回村里连自己所听加自己所想弄出来一个搞笑的故事：林副统帅披了马克思的皮大衣（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偷了三只鸡（偷乘三叉戟飞机），带着老婆和儿子（叶群和林立果）跑得满头大汗（跑到温都尔汗），最后还是被追回来了（飞机坠毁了）。不管怎样说，9·13事件林彪是跑掉了，折戟沉沙、抛尸荒野，葬在异国他乡。一个冷笑话把领袖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高大上计划弄得面目全非。尽管后来的批林批孔找到孔夫子来做陪绑让全国人民有事可做不必另作遐想，可是领袖自己的尴尬和无奈是从脸上抹不去的，也是从心头无法消除的。就算林彪是反对毛泽东的，那当初怀疑林彪的中学生伊林、涤西又该作何说法呢？忠于这样的领袖能保证付出自己的革命行动，就能实现崇高理想吗？眼下不是迷茫而简直是有点愤慨。我不想再打鱼，还是晒网吧。自以为清醒的我，向单位共青团组织毅然提出退团申请。

6，日落河山依旧明

1976年秋天我在平利八仙区负责区、社两级广播放大站的机器维修。九月的一天我去到松鸦公社放大站修理扩大机。下午两点多钟机器修好了，我正在试机播出，忽然收到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的一则通知：各地广播电台请注意，各地广播电台请注意。今天下午4点钟本台将有重要广播，请到时注意收听和转播。作为县广播站的专业技术人员，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立即报告了公社党委。下午四点整，刚刚修好的公社放大站扩大机准时转出由县站传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哀乐和讣告——毛泽东主席逝世了。这天是九月九号。

在文革那政治恐惧、人人自危的日子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务必更加严格的谨言慎行，在这样非常时期任何不妥的语言和行为都极有可能招来无妄之灾和杀身之祸。记得在平利县召开的第一次群众哀悼大会上，就当众逮捕了一位村支书，他的现行反革命罪行就是——公社通知该村召开群众哀悼大会时，该村支书不在岗位而是跑到女婿家吃庆生酒宴去了。仅此而已。

“心中的红太阳”终于坠落，大自然的太阳依旧升起。表面上的公众悲天悯地情绪犹如天塌，可是更多的人心底里是否在猜测中放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这个被不停地反复折腾的可怜的民族是不是该消停一会儿啦？

7，喋血中“头彩”

1976年的金秋迎来了欢腾的十月。华国锋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联合党内健康力量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旷日持久祸国殃民的文革运动。群众多年心头的积怨一朝释放，被压抑的人性和真情涌向多彩的大众生活。

77年秋季开始了文革以后首次的大学招生。那年冬季听到广播里传来科学院招考研究生的消息，我马上翻出大学高等数学、普通物理等课程的教材，不等陕西省招生委员会发出报名通知，我先自己估摸着各科目考试的范围，开始了考研的艰难复习。78年春节刚过研究生招考初试开始了。这是怎样的一次亘古未有的选拔考试！招考的学校根据考生所报专业把各科考题封口装在一只密封档案袋内，交由机密信使，由内部渠道直送考生所在市县组织部门，再分送达市县教育局。开考那天，平利县主管文教的副书记亲临现场做试卷开封，宣布开考。大家报考的都是不同学校的不同专业，所有考生的试卷各不相同。我们分别围坐在文教局俱乐部里两张大大的乒乓球桌四周，只要考生不相互交谈，监考人员也不怕他们互看试题和答案。初试顺利通过，五门试卷英语、政治、物理、数学和专业分别以七十几、六十几、五十几、四十几和三十几的成绩获得复试资格。78年夏赴合肥中国科大专业复试，终于由北航向科大统筹选调合格考生，录取到北京航空学院二系雷达微波专业。78年9月在这个金色秋天里我收获了苦苦奋斗的考研成果。

回顾整个平利县的研究生招生、初试、复试和录取的战战绩：报名12人，参加初试8人（7份考卷有效），3人通过初试获得复试资格，1人通过复试被招考单位录取。本人成为全县唯一通过初试复试单兵突出重围的光荣的一人。

78年夏天去合肥参加中国科大研究生专业复试的旅途中发生的一件“流血事件”让我终生难忘。78年的时候，作为战备修筑的阳安线（阳平关至安康）铁路已经完工通车。由于铁路地基占用了水稻良田，当地民众的抵触情绪长时间未能平息。每当列车通过时受到群众抛石打击的事件时有发生。我在乘坐安康至西安的火车通过阳安线汉中洋县路段时就遇上了一次“打击列车”事件并且头部负伤。那天从安康登上列车之后我坐在背对行进方向的座椅上一路顺遂。列车西行路过汉中平原，为了聊天我临时挪到走廊斜对面的座位，恰好迎着列车行进的方向。正和人说着话忽然眼前一红感觉脸上有血往下流，低头看时，胸前的白汗衫已经染红一片。等缓过劲来时才感觉到额头有点疼——是有石块从开着的窗户扔进来迎面砸中了我的额头，我受伤了。邻座旅客很快在列车中间通道里找到那件惹祸的“凶器”——

一块墨水瓶大小的鹅卵石。列车员很快找来止血纱布帮我包扎伤口，不少赶来看热闹的同车厢旅客热情的安慰我并且问这问那。当听说我是赶往合肥中国科大参加研究生招考复试时，围观人群中也有两个也是外出去复试的大学生连声高呼：这下子好了，你肯定录取！众人不解地问这是何故。他们哈哈一笑：嗨，这还不简单。你看他不是已经中了“头彩”了吗？于是众人似有所悟嬉笑而散。就这样挨了石头砸，受了伤，还给予“头彩”新的解读，确实有点意思。

8，档案里面见真情

78年夏在科大参加复试期间，626毕业留校任教的李津生同学找我谈过话，给我通报了科大党委准备为科大雄师群众组织平反的情况。他告诉我如果个人要求平反，需要本人给校党委写一个情况说明和要求平反的申请。他说你工作在边远山区信息闭塞，我给你讲了你抓紧写申诉材料。这样，我在北航读研期间，1979年科大党委颁发80号文件给我作出平反决定。专案组的韩非平老师专门打长途电话到北航找到我说明情况。他说：按照规定要把档案里一切有关评价个人文革表现的“污蔑不实之词文字材料”全部撤出销毁，但是你的档案里没有这些东西。至此我才真的相信科大东方红没有向江晓东档案里塞进“污蔑不实之词的文字材料”类的黑材料，也才理解为什么我会有一路来的顺境。

如同前述没有经历的“抄家”，文革中不向受迫害当事人档案里塞进黑材料在当时也是鲜见的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情节。

（七）走出困沌

1，沌之破题

困者束缚之状也。有外施之枷锁绳索使之困，亦有自身眼界狭窄思维局限受之困。沌者浑浊朦胧之谓也。视野迷茫则举步维艰，思维混沌便无所适从。有此二者，做事难办做人难成。

2，叙述史实的标尺

大家可能会发现，在前面各章中我列举文革史实时所用文字大多贴近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语言习惯。我不想用事后的理解来阐述，更不会拿后现代的标准来描绘历史的文革。因为这样做不光给读者以时代穿越之感，而且反过来可能会给作者带来叙事推理逻辑上的尴尬。历史之所以为历史，就是因为它是旧的真实。我不排斥用新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但那是和叙述史实不在同一个时间层面上的事。只有稳妥平白地讲述了历史的真实才会有人们以新眼光审视史实的可能。

3，叙述文革史实也将成为新的历史

开始我打算把关于科大雄师的通信作为单独一章安插在正文之内，文稿送科大校友参阅之后反馈的意见是通信安排在正文之中打乱了全篇的叙事结构，建议还是作为附录收集在篇后为好。思考再三，我采纳了这个不错的主意。只是从2010年到现在又过去了7年，那时没有今天凸现的对文革认知的纷争和烦恼，而今天平地起高楼似的重又复述那样多的文革史实，是否会有从人性丑恶暗中滋生的功利之心出来作祟？提防很有必要，没有更好。

4，只要永远的真实，不要趋炎附势的政治正确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先说一句，要做到这一点不难，那就是固守真实——做到两个字：诚实。然后再来讲为什么要这样做。

还是用文革的史例来分析最容易理解，就拿科大雄师当初的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来说。1967年的新年元旦，雄师大字报不只是公布在科大校园里，它还贴到了西单，对文革寒冬中的北京市民来说，它真是一份不赖的新年贺礼。造反派称它是“攻击中央文革的政治檄文”，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炮”，其影响之大据说都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政治局五常委之一的康生。雄师自始至终坚称大字报对文革小组是善意的批评、热心的建议，完全是为了运动健康的发展，绝没有“打倒”的动机也没有“炮打”的理由。造反派把雄师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中央文革明令专政机关收押造反派“揪送”的科大雄师成员进行“拘留审查”，这是不折不扣的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这也是科大雄师一案成为冤案的历史缘由。时间到了十二年后的1979年5月，科大党委给“雄师”群众组织平反时专门通知周平到校参加平反大会。会后周平找到校平反办公室特意声明“我们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任何人。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民主的生活，是符合宪法的。不能因为有不同意见就说是反对”。

周平的意见无疑是对的。不管是雄师受压迫被镇压时还是终于平反甚至被赞扬时，始终如一的坚持同一态度和观点，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事实上雄师的大字报既没有“打倒”的力度也没有“炮轰”的角度，它只是从“十六条”理性因素出发对中央文革背离党的一贯政策的非程序行为一纸批评建议书。

假如不是像周平这样，在雄师被取缔受镇压时你为自己辩解说我是提意见，轮到给雄师平反时你又说我写大字报就是反中央文革的。那么好，我来问你：首先这一前一后两种说法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如果前面说的实话，那平反时你所说就是冒功领赏。如果后面说的真实那你前面说的就是避重就轻。总之你起码犯了历史逻辑的错误，前后说法的不一致必然导致你走入自设尴尬的境地。

5，历史的感慨，生活的箴言

最后一章夹叙夹议到这里该是全篇收尾的时候了。本篇对所有文革史实的记录都是秉持“写历史真实，留后人鉴传”的宗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心持笔以口传言。

对自己在文革中的科大雄师这一段经历，我引用以往在西祠胡同寂寞山庄板块的文帖里的一段话来表白——历史的坎坎坷坷，今日说来无异笑谈；人生有此历练，饭后茶余又多一份谈资。细细想来，当年行为只凭年轻意气，多轻信而少自思，多盲从而少自主，所吃苦头盖由自生，怪不得别人。

人们常说个人的历史经验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其实这笔财富的实际价值还需要他自己用全副身心的诚实来守护。而我则笃信并恪守——只有真实才能自立；只有诚实才会永久。虽然简单，但不仅是记住；即使艰难，也还要坦然走过。

◇ 后记

这篇记述文革史实的文稿是应科大60周年华诞纪念征文之邀，书写文革历史，留与后人为鉴。现在终于完成全篇写作，可以卸下肩上的负担了。还需要交代的是，作者从北航读

研以后的工作去向，以免关心作者境遇的读者总是心悬一念。（微信群里就曾经听 6 2 6 3 的孙锦禄同学给他太太念叨过：那个倒霉的江晓东不知道后来怎么弄了。）

我于 1 9 7 8 年 1 0 月入读北航二系雷达微波专业硕士研究生。8 1 年 7 月毕业获工学硕士学位。同年参军至海军太原高级电子工程专科学校微波教研室任讲师。9 0 年随海军电子工程学院南迁至南京（院址江浦珠江镇）继续任教。9 2 年初职务晋升为副教授，级衔文职 3 级。9 9 年 2 月退休。2 0 0 4 年海电院合并至武汉海军工程大学，原海电院退休人员划归海军指挥学院管理。2 0 1 4 年 1 1 月由民政局南京建邺区军休所接收成为南京民政局管理的军休人员，脱离军籍恢复居民户口。

年逾七十的我退休生活很充实。我参加了军休所的讲师团和小乐队，每年春秋有外出旅游的计划。平时在家练书法、上电脑、玩手机还做网页。我的个人网站从 0 5 年算起坚持十多年了。同时期玩网页的老伙伴们的网站大多荒掉了。我的网站虽然难得实时更新，毕竟还是硕果仅存。诸位如有闲空，不妨到我的主页——“老江的家”去踩踩脚印。网址：<http://www.jmd2008.com/>。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顶级域名哎。

（全篇完）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邮箱：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 | |
